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以史为镜、以史明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新华社北京6月15日电 6月16日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史为镜、以史明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文章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情十分必要,对开创未来也十分必要。要围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问题,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加强思想舆论引导,坚定广大干部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进一步激发全体人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

文章指出,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要努力从党走过的风云激荡的历史中、从党开创和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中、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长期实践中,深化对党的信赖,坚定对党的领导的信念。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脑子要特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立场要特别坚定,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

文章指出,要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人们深入理解为什么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要很好学习了解党史、新中国史,守住党领导人民创立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祁玉民被开除党籍

新华社沈阳6月15日电 日前,经辽宁省委批准,辽宁省纪委监委对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祁玉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祁玉民丧失理想信念,无视党纪国法,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金,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违反议事规则,决定重大问题,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利用职权在干部选拔任用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钱款,违规经商办企业,违规兼职取酬,搞钱色交易;对华晨集团虚报利润问题失职失责;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索取、非法收受财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给他人进行营利活动;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祁玉民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挪用公款犯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甚至十九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辽宁省纪委监委会议研究并报辽宁省省委批准,决定给予祁玉民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樊锦诗:扎根大漠心系敦煌的国宝守护人

初夏的江南进入梅雨季,杭州溽热的天气与大约3000公里外的西北敦煌迥异,但这两座遥隔山水、看似毫不相干的城市却因为一个人被联系在了一起。

她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1938年,祖籍杭州的樊锦诗出生在北京,自1963年大学毕业后,她便开始了与莫高窟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相守。在她和同事的努力下,莫高窟在1987年成为中国首批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遗产地,并逐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全球典范。

经历过承受了战乱和病痛的年少时期,1958年樊锦诗考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专业。大学时期,老师宿白的一番话深深印在她的记忆中:一二十年后,谁能沉得下心,谁才能够做出大的学问;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人潜心做学问。

樊锦诗与敦煌,初次结缘于1962年的毕业实习。尽管当时因为强烈水土不服而提前结束实习,但她总是说“敦煌是我的宿命”。

当年的莫高窟几乎与世隔绝,因为没有现代交通工具,从莫高窟去一趟敦煌县城要走大半天路。研究人员住土房、喝咸水,还要在洞窟里进行临摹壁画、保护修复、研究文献等工作,条件非常艰苦。

“如果说我从来没有犹豫过、没有动摇过,那是假话。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确实是两个世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感到孤独。”樊锦诗说,“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20世纪初,藏有5万余件中古时期写本的敦煌藏经洞被发现,随后大量文物流失海外的历史牵动了学术界乃至



认领公告

菏泽市巨野县龙堌镇观集行政村村民安心芝于2001年3月1日在菏泽市巨野县龙堌镇观集行政村拾到一名男婴,请该男婴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效证件与菏泽市巨野县龙堌镇行政村村民安心芝联系。

电话:18954758666

于无声处听惊雷 ——中共百年回望

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一幅苍劲有力的书法作品静静陈列——

“作始也简 将毕也钜”。

落款:“董必武 一九五六年二月”。

是年2月,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来到一大会址,在帮助工作人员回忆了相关历史细节后,年届七旬的董必武感慨万千,挥毫写下这8个大字。

“这幅字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党和人民的事业越是向前发展,我们就越能感受到这句话的分量。”中共一大纪念馆馆长薛峰说。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源自《庄子》,原文“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人们把其义引申为:任何具有远大前程的事业,哪怕在初创时微不足道,等到将要完成时也必然发展得非常巨大。

许多历史事件正是如此。

站在当下,回望百年,我们把历史的镜头对准1921年。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在寻常日子召开的、在当时报纸上没有一点报道的会议,无声,却有力地,在风雨如晦的中国大地炸响了开天辟地的惊雷,为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写下了光辉的起笔。

在旧报章里,在泛黄的档案资料里,在亲历者的回忆里,我们还原那些曾经模糊的细节,探寻历经百年愈加清晰的大义。

(一)“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

1921年7月23日,大暑,上海空气潮湿闷热。

入夜,法租界里一幢民居亮起昏黄的灯光。屋内,31岁的李汉俊正等着他的客人。

这幢位于望志路106号、有着青色砖墙和红色窗棂的石库门房子,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俩一年前租下的,外界称其为“李公馆”。在李书城爱人薛文淑印象里,弟弟李汉俊每天都很忙,常有朋友找他,搬来这里后,朋友来得更多了,时常还有外国人。

李汉俊身边,一张条桌上摆放着十几只雕花茶杯、一只紫铜烟缸和一只粉色花瓶,桌子四周围有一圈圆凳,东、西墙边又各放置了一只茶几和两张椅子。这样的布置,使这间屋子略显局促。

过了一会儿,客人陆续来了,多是年轻模样,但打扮各不相同,有穿长衫的,有穿中山装的,有穿西装的,有人留着八字胡须,也有人一脸稚气……另有两名外国人,高鼻梁、目光敏锐。

李汉俊身边,一张条桌上摆放着十几只雕花茶杯、一只紫铜烟缸和一只粉色花瓶,桌子四周围有一圈圆凳,东、西墙边又各放置了一只茶几和两张椅子。这样的布置,使这间屋子略显局促。

过了一会儿,客人陆续来了,多是年轻模样,但打扮各不相同,有穿长衫的,有穿中山装的,有穿西装的,有人留着八字胡须,也有人一脸稚气……另有两名外国人,高鼻梁、目光敏锐。

李汉俊身边,一张条桌上摆放着十几只雕花茶杯、一只紫铜烟缸和一只粉色花瓶,桌子四周围有一圈圆凳,东、西墙边又各放置了一只茶几和两张椅子。这样的布置,使这间屋子略显局促。

过了一会儿,客人陆续来了,多是年轻模样,但打扮各不相同,有穿长衫的,有穿中山装的,有穿西装的,有人留着八字胡须,也有人一脸稚气……另有两名外国人,高鼻梁、目光敏锐。

李汉俊身边,一张条桌上摆放着十几只雕花茶杯、一只紫铜烟缸和一只粉色花瓶,桌子四周围有一圈圆凳,东、西墙边又各放置了一只茶几和两张椅子。这样的布置,使这间屋子略显局促。

“我只是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李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薛文淑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

当时的绝大多数上海市民、中国民众决不会想到,在自己陷入艰辛困顿之际,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志士,已经悄然成立了一个政党。这个政党,将彻底改变这座城市、这个国家,乃至今后的世界大格局。

“在这批最早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集中体现了那一代中国青年爱国奋斗、为民造福的担当精神,开天辟地、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忻平说。

(二)“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

百年沧海桑田。当年“李公馆”所在的地界,早已从洋人的“国中之国”变成人民城市的新天地,是上海极具特色的商业街区。

百年薪火相传。梧桐掩映下,那幢古朴庄重的小楼模样未改,乌漆大门上的铜环熠熠生辉,越来越多年轻人专程而来,感

悟赤诚初心。

“看到会址外流光溢彩的街景、衣着时尚的行人,有时也觉得反差巨大。但再一想,这现代化的城市、安居乐业的人民,不正是建党先驱们朝思暮想的景象吗?”一位青年参观者感慨。

真挚的情感穿越百年,与彼时的青年产生共鸣。

1921年,23岁的王瑞俊写下《肇在造化——赠友人》:“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

怀揣这份憧憬,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尽美,志在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尽善尽美”。

他寄予希望的方式,是唤醒劳工,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1921年6月,湘江之畔,28岁的毛泽东接到一份“开会通知”,其中要求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各派代表两人,尽快到上海开会。

毛泽东兴奋不已,立即与何叔衡谋划秘密启程。

“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与何叔衡在《湖南通俗报》共事的谢觉哉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谢觉哉后来解释,5个圆圈指“共产主义者”,因怕泄密,故用圆圈代替。

发出这份“开会通知”的,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成立,陈独秀为书记。

“这不是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而是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面向全国,面向世界上有中国劳动群众的地方,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等方式,积极推动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说。

一封封信函由上海发出、一个个“使者”从上海走出,革命的火种散播开来。此后一年时间里,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东京、巴黎等地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陆续成立。这既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写下了生动续章,更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上海的“邀请”,得到四面八方的响应。1921年6月末至7月中旬,9位外地代表陆续抵沪。他们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秘密租住在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的博文女校,和衣睡在空教室的地铺上。此地,距“李公馆”步行只要几分钟;此刻,闷热的空气中正酝酿着惊雷。

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近百年时间里,中国国运一路衰颓,已然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沼,无数仁人志士的强国梦想看上去愈加遥不可及。

1921年7月在《共产党》月刊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实质不过是日英美三国分赃中国的会议。他号召同胞:“不要希望什么太平洋会议,速行社会革命罢!”

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发生转变之时,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变化。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工人总数达200余万人,仅上海就有56万人。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锻造了上海工人阶级极强的反抗性。

1920年末,《共产党》月刊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作出乐观预见:“照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五年,上海劳动界,必定能够演出惊天动地地打倒资本制度的事业来。”

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具先见的判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一旦与代表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结合,必将迸发出无比巨大的力量!

(四)“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这个秘密会议,四周暗流涌动。

参加会议的包惠僧回忆,7月30日晚,宣布开会不到半个钟点,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了会场。“我们问他干什么?他把我们看了一眼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就匆忙下楼去了。马林则很机警地说:‘一定是包打听,我们马上解散,再定期开会’。”

果然,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了会场。

因担心住处遭到搜查,代表们立即前往《新青年》编辑部暂避。大约过了两个钟点,包惠僧放心不下“留守”的李汉俊、陈公博,返回“李公馆”探看。李汉俊告诉他,写字桌抽屉内就有一份党的纲领,没有被发现,很侥幸!

研究者认为,这一变故与租界警方对共产国际参会代表马林的监控有关。

至此,上海的会议不得不告一段落,代表们从石库门出发,登上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大会在紧张气氛下继续进行……

开会时,李达代表的夫人王会悟一直坐在船头,但她全无赏景的闲情。“假如有一艘船靠近,我就叩击船船门,提醒他们停止开会。”王会悟晚年回忆道。为了掩护,她甚至在会议桌上预先摆放了一副麻将牌。

从上海到嘉兴,一周多时间里,代表们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热烈探讨改造国家的办法。会场内外,两个中国,一个昏暗、痛苦,一个则昭示着她的青春、梦想。

1921年7月27日的《民国日报》上,登载了上海浦东英美烟草公司华工罢工的消息。

文中列着工人提出的条件:撤换虐待工人的监工;以后不准虐待工人;无论如何,不准开除工人的代表……

正是在这天,代表们开始讨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纲领第一条即旗帜鲜明:“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

再看7月28日的《民国日报》,一则《安徽选之奇奇怪怪》的新闻,直指资产阶级政府“城墙坍倒选举”“百余万人轮流投票千余张”的虚伪行径。作者直言:“长此以往,选政何堪设想?”

代表们决心与这样的弊政划清界限,使自己的党成为一个目标明确、组织严密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在纲领中明确:“候补党员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满后,经多数党员同意,始得为正式党员……”

多位代表日后回忆,会场内发生多次“有力的争论”。例如,在关于是否支持国民党特别允许后可担任政府委员或国会议员的问题上,纲领在注释中留了个尾巴:

“此条款引起激烈争论,最后留至1922年第二次会议再作决定。”

分歧与争论,折射政党初创时期的真实状态。13位代表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有人主张“实业救国”,有人信奉“改良主义”,还有人宣扬“无政府主义”,即使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每个人的理解程度也不尽相同。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些年轻人时不我待地扛起了救亡图强的责任。“一经掌握马克思主义,就想马上用于改造世界。”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说,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鲜明特性,就是永远追求真理、勇于修正错误,最终使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把目光再次聚焦这群年轻人——13位代表中,8人有大学学历,其中4人留学日本,3人就读于北京大学,而在当时,全国能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不到1%。

显然,以他们的学识,足可衣食无忧。参与建党,投身革命,乃至牺牲生命,他们追求的不是个人命运的改变,而是苦难民族的新生。

正如1920年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关于生命的探讨:“你见过蝗虫,他们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那过去底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

(五)尾声: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1921年元旦,作家沈禹钟在《申报》副刊《自由谭》上发文“祝民国十年”,他语带希冀地写道:“谋国之福,胥在执政者之稍具人心……毋纵而欲,毋貳而心,毋逞小念以乱大谋……若是,则我国转弱为强将由此发轫。”

同岁年末,同样是《自由谭》,作家许一鸥却忙不迭“送民国十年”:“你今年借了多少外债,丧失多少权利,替百姓增多少负担